

1959 — 1989

内蒙古大学学报卅周年 论文选

NEIMONGGOLDAXUE
XUEBAOSANSHIZHOU
NIANLUNWENXUAN

刘成 张敬秀 彩娜 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出成果得人才显特色(代序)	包祥(1)
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	胡钟达(4)
从察罕脑儿看元代的伊克昭盟地区	周清澍(21)
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述略	王雄 薄音湖(40)
“右翼之战”与达延汗统治的最终确立	乌兰(55)
清朝覆亡之际驻京蒙古王公的政治活动	汪炳明(70)
元上都宫殿楼阁考	叶新民(84)
试论蒙古族的“商业精神”	沈斌华(96)
近十年来我国契丹字研究	陈乃雄(110)
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的我见	林千(125)
略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	周天中(139)
内蒙古民族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郝维民(15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的形成	周呈芳(166)
也谈孔子的历史地位	郝宜今(177)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性质、 基本特征和主要矛盾	谷景华(191)
试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思路	侯相林(204)
从竹简《秦律》看秦代的经济立法	潘世宪(223)
论民法与增强企业活力	陈又遵(237)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	陈震 许柏年(251)
释舅姑	孙玉涛(266)
鲁迅的“画灵魂”论初探	张国栋(271)
曹雪芹以配药隐喻配婚	林方直(285)

乾坤留正气诗歌唤国魂

- 略论近代爱国诗歌…………… 鲁歌 (296)
- 呼和浩特汉语方言中名词的重叠形式……………李作南 李仁孝 (312)
- 论英语中的后置形容词…………… 吴持哲 (326)
- 史料间的矛盾与考据中的判断…………… 任嘉禾 (336)
- 编者的话…………… (352)

出成果 得人才 显特色

(代序)

包 祥

晴空朗月可鉴,万物硕果尤丰。在1989年金秋粲然之际,恰逢本刊创办30年。30年来内蒙古大学逐渐地成长壮大,本刊亦得天时、地利、人和之惠,迎来而立之年。“天时”者,此处谓时代之潮流。60年代以来,世界学术、文献、情报大发展,是本刊学术交流和借鉴的大环境。“地利”者,此谓地处内蒙古综合大学的本刊之民族、地理特点,是本刊办出特色得天独厚的条件。“人和”者,是谓本刊所依靠的一支投稿队伍,主要是30年来渐臻成熟的我校学术人才,这是本刊从创业到收获的基础。本刊经历了“火红”的年代,有过逆境中的思考。令人欣慰的是,在上述动力的促使下,本刊在30年中为出人才、出成果,为繁荣学术,尽了微薄之力。

30年来本刊共出季刊67期,发表学术成果千篇有余。有赖于此,本刊成为国内外学者所期望的蒙古学和北方少数民族学特色鲜明的刊物,同时在其他学科领域也不乏数量可观的力作,很多论文为国内外多种报刊所转录。在这种浓厚的学术空气中,30年前的中青年作者有的今已成为学术带头人,知名于海内外学界,有的作者在他们步入晚年时,得以回首自己在本刊所留新颖而高雅的风姿;近几年成长起来的青年作者,亦通过本刊所载的学术

成果，坚实了个人的志趣，并迅速成才。本刊工作人员也在逆境而严谨的学风中受到了鞭策和锻炼。

我们也感到本刊有诸多不足之处，这也是我们记取教训、改进工作的动力之一。广大读者、作者对本刊倍加爱护，不时地提出改进意见。希望学界众人继续对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批评。提高刊物质量是对本刊创办30周年最好的纪念。

为此，本刊准备着力抓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将坚定的政治方向和严格的学术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总潮流中，创造性地研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发挥出来，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加以丰富和发展，为祖国的现代化、民族的现代化提供学术依据。对于国际上新颖的学术研究要积极地加以借鉴；对资本主义腐朽的一面要进行批判性的研讨。（二）欢迎新观点、新资料、新方法、新领域的探讨。作为学术刊物，这“四新”是我们审稿的重要的学术标准，具体到每篇文章，有“一新”亦可。（三）本刊是学术性刊物，理所当然要继续加强其学术性。既注意基础性研究，又注意应用性研究。不论是哪方面的文章，在学术问题上一定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本刊坚持在学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决不因学术观点分歧而对论文作出优劣不同的评价和处置。（四）开辟多种专题和栏目。既重视宏观论证的学术成果，又重视微观考究的论文；既要横向比较，又要纵向探讨，注意国内外大的学术环境，纵观古往今来的规律；不抹煞少数鸿篇大作，还鼓励万字以下精辟的论证；学术论证和学术动态兼而有之，理论分析和资料评介各显其长；老、中、青作者的论文，在不同的栏目中占有各自的地位。（五）继续体现本刊的民族特色、地区特点，蒙古学和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学的论文、内蒙古地区特点的论文应继续占有显著地位。同时也有相当比例的其他社会科学和边缘学科的各种论文，重点与一般灵活地相结合。本刊的重点之一最终地落实到它的学术特色上

来。

上述目标能否实现，本刊所追求的标准能否如愿，关键在于我们的投稿队伍应是一支基础扎实而思想活跃的研究队伍。过去的30年，广大读者对本刊的爱护，众多作者对本刊的信赖，诸位专家为本刊审稿把关，我们在此纪念刊上深表谢意。今后，望诸公更加奋力地推进我们这叶扁舟飘洋过海，让时代的列车牵引着咱们跨越有限和无限的时空领域。我们唯恐有负诸公厚望，而以此共勉。

（选自1989年第4期——创刊30周年纪念刊）

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

胡钟达

呼和浩特旧城即归化城究竟建立在哪一年，在旧有史籍和方志诸书中，一方面是语焉不详，一方面又互有矛盾。这种矛盾的说法，概括起来，不外三种：

一、归化城建于明嘉靖（后期）或隆庆年间（约1550至1570年）；

二、归化城建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

三、归化城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

根据我们初步探索的结果，我们认为，过去看来都有相当根据的三种说法，无一不是错误的。归化城实际上是在万历九年（1581年）建成或基本建成的。

在讨论归化建城的年代问题以前，我们首先要谈一谈同建城问题有关的几个人物和建城的历史背景。归化城是俺答汗和三娘子征发蒙汉劳动人民兴建的。在明代嘉靖前期，也就是达延汗统治的末期，俺答就率领土默特部驻牧在大同山西边外的古丰州地带。嘉靖后期和隆庆年间，也就是16世纪中期以后，他的势力大大伸张，成为漠南蒙古的霸主。但是古丰州，也就是呼和浩特地区，一直是他的统治中心所在。三娘子是俺答汗晚年所娶的一位夫人。自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汗被明朝政府封为顺义王以后，三娘子的地位就日益重要起来。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汗

死后，三娘子更是土默特部蒙族统治集团中的中心人物。万历十五年（1587年），三娘子被明朝政府封为忠顺夫人。

除了俺答和三娘子外，嘉靖年间投奔俺答的山西地区的白莲教领袖，如丘富、赵全等，也是同归化建城问题有联系的人物。

这些白莲教的领袖，本来都是同山西地区的农民、城市贫民和边防戍卒有密切联系的。可是在他们投奔俺答以后，他们的地位变化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也就随之变化了。他们同俺答的关系如何，他们在投奔俺答以后做了一些什么事，《明史》王崇古传有一段概括而又比较全面的记载：

“俺答……纳叛人赵全等，据古丰州地，招亡命（按指山西的农民、城市贫民、边防戍卒等不堪忍受明朝的文武官吏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逃亡到长城边外的人）数万，屋居佃作，号曰板升。全等尊俺答为帝，为治城郭宫殿，亦自治第，制度如王者，署其门曰‘开化府’。又日夜教俺答为兵，东入蓟昌，西掠忻代。游骑薄平阳、灵石至潞安以北。起嘉靖辛丑（1541年），扰边者三十年。”①

隆庆四年到五年之间（1570年—1571年）俺答汗同明朝政府达成了协议：大同、宣府、山西各镇都开辟了蒙汉之间的通商市集，每年蒙族的首领和人民可以马匹、牲畜及其他牧区的特产同明朝政府和汉族人民交换绸缎、布匹、锅釜和蒙族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俺答及其所属各蒙族首领每年向明朝皇帝进贡，明朝政府封俺答为顺义王，并授俺答属下的蒙族首领以大小不同的官职。从此以后一直到明朝末年，长城内外大部分地区蒙汉两族之间基本上维持着和平友好的局面。而赵全等人，也在达成协议的同时，由俺答解送给明朝政府，被明朝政府处以死刑。

归化城建于嘉靖或隆庆年间，这一说的主要根据是《明史》王崇古传。明朝政府同俺答达成协议的前后，王崇古是当时的宣大总督。他同当时的宰辅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极力主张达成封贡之

议的。王崇古于隆庆五年春上疏详陈封贡之利以后，经过廷议，明穆宗接受了王崇古的意见，于是，“乃诏封俺答顺义王，名所居城曰‘归化’”②。在《明史》刊行以后编撰的《明纪》和《明通鉴》中有关此事的记载，其措辞和“明史”相同③。

许多人就根据这一条记载，认为归化城之建立当在俺答封王以前。在封王之时，只是为这个城取了一个汉文名称而已。所以这个城必然是在隆庆五年以前，并且很有可能是在嘉靖年间建立的。

假如说，根据《明史》的记载望文生义，还不能肯定归化城的修建是在隆庆年间还是在嘉靖年间，在《明史》刊行以后所编纂的《大清一统志》上，就直接把归化城的建立肯定在嘉靖年间了，《大清一统志》的有关记载可摘引如下：

“嘉靖间谕达（按即俺答）筑城于丰州滩，采木架屋以居，谓之‘板升’，是为西土默特。隆庆间，封谕达为顺义王，名其城曰‘归化’。”④

《大清一统志》的记载，此后又成为各种有关呼和浩特的地方志书的根据。如《土默特志》和《归绥县志》，其有关归化建城的记载，就完全抄袭或基本上抄袭《大清一统志》⑤。

最近几年出版的有关蒙古史的著作或有关呼和浩特的记载中，在追溯归化建城的年代时，多数都是以《明史》、《明通鉴》和《大清一统志》、《归绥县志》等为根据的。

归化城建立于万历三年，这一说的主要根据是《明实录》。其有关记载可摘引如下：

“（隆庆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为顺义王。”

“（万历三年十月）丙子，顺义王俺答遣……使乞佛象、经文、蟒段等物，所盖城寺，乞赐城名。镇臣以闻。……赐城名‘归化’，佛经佛象，许该镇量写铸给与。”⑥

在《明实录》中的神宗实录尚未编纂以前，瞿九思在其于万

历四十年写成的《万历武功录》中，也肯定归化城之得名是在万历三年。其原文如下：

“（万历三年），其十月，又市得胜。是月俺答请城名。……于是……名其城曰‘归化’。”⑦

谈迁在明末写《国榷》一书，其内容虽不完全以实录为根据，但是在其有关归化城的记载中，所述大体上和实录一致：

“（万历三年十月）丙子，俺答乞佛象蟒段。且城市成，求赐名，赐城名曰‘归化’，量给经象。”⑧

一般说来，实录关于这一类事的记载应该是相当可靠的。何况还有其他两部书，一个成书在实录以前，一个成书在实录以后，都同实录的记载一致。这样，实录中有关记载的可靠性，似乎就更加不容置疑了。可是问题在于，《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和实录不同。根据《明史纪事本末》，万历三年俺答所筑的城为“福化城”。“归化”城的建立，那是另一年的事情。现在我们把《明史纪事本末》的有关记载摘引如下：

“（隆庆）五年三月己丑，封俺答为顺义王。”

“（万历）三年……十月，俺答乞佛象蟒段；且城市成，求赐名。赐城名‘福化’，量给其请。”

“（万历）十四年二月，顺义王黄台吉死，子扯力克袭位。初，把汉那吉归，俺答命主‘板升’，号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马雄诸部。癸未（按系万历十一年）年死，三娘子欲命其子不他失礼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不从，阴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为妻。三娘子名哈屯，别筑城居，朝廷赐名‘归化’。至是，黄台吉死，扯力克当嗣。督臣郑洛复谕扯力克曰：娘子三世归顺，汝能与娘子聚，则封；不亟聚，封别有属也。扯力克尽逐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帐中合婚。……十五年秋七月，封扯力克为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⑨

按《明史纪事本末》不同于以前各史的纪事本末。以前各史

的纪事本末成书多在纪传体的“正史”和编年体的通鉴之后，而且多半以先出的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史书为主要根据，依事分类，加以删削排比而成。所以一般的纪事本末虽在阅览时有方便之处，可是史料价值是不高的。独《明史纪事本末》成书在《明史》、《明纪》、《明通鉴》以前，在清初就已刊行。根据张岱给周馥伯的一封信来看，张岱是《明史纪事本末》的编纂人之一，甚至可能是主要执笔人^⑩。张岱是明末的一位著名文学家兼史学家。《明史纪事本末》，有这样一位对明史研究有素的学者参加编纂工作，它的史料价值在某些方面是不容我们忽视的。假如《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在某些方面同《明实录》和《明史》的记载有出入，究竟是那一种书的记载确实可靠，必须经过仔细研究才能加以判断。

由于《明实录》流传不广，《万历武功录》的明代全刻本据闻现藏天津图书馆，可能是唯一保存下来的海内孤本。《万历武功录》中有关明代九边的部分，1935年由北京隆福寺街文殿阁书庄排印刊行，错字很多，也一向没有得到研究明史和明代蒙古史者的重视。而《国榷》过去仅有抄本，中华书局把它影印出来，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因而归化城建于万历三年之说，过去除乾隆年间刊行的《口北三厅志》外，几乎没有人曾在其他书中加以引用。与此相反，《明史纪事本末》一向流传很广。凡是注意到《明史纪事本末》有关归化建城记载的人，把它拿来同《明史》、《明纪》、《明通鉴》的有关记载对照一下，自然会认为纪事本末的记载比较翔实得多，并且从中引申出归化城是建于万历十四年的结论。这一说，荣祥在他的《呼和浩特市沿革记要稿》中持之最力，并有种种论证^⑪。

在我们讨论《明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的两种互相矛盾的记载究竟是哪一种比较确实可靠以前，所谓归化城建于嘉靖或隆庆年间之说，根据实录和纪事本末来核对，已经可以不攻自破

了。因为实录和纪事本末的记载虽然彼此并不一致，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1、归化城是建于万历年间而不是建于嘉靖或隆庆年间；2、封俺答为顺义王和命城名曰“归化”并不是同一年发生的事。《明史》为了行文简括起见，把命城名曰“归化”这件事附记在封俺答为顺义王之后。而《明纪》和《明通鉴》在这个问题上因袭《明史》，也就把这两件事并记在一起。人们由此推论归化城是建立于俺答封王以前，那是对《明史》所述的误解。而《大清一统志》把赵全等人为俺答建板升和归化建城这两件不同的事混淆起来，并肯定“板升”即“归化”，同时并肯定归化城是在嘉靖年间兴建的；这里主观推想的成分很多，也就难免不做出错误的结论了。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是《明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这两种不同的记载，究竟哪一种更可靠一些。这其中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加以澄清：

一、万历三年俺答所建的城究竟是“福化”还是“归化”？

二、假如可以肯定万历三年俺答所建的是“福化”城，那么“归化”城究竟是哪一年建立的？

万历三年俺答所建的为福化城而非归化城，这一件事不仅《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得很明确，在方孔炤的《全边略记》中，记载得也很明确。《全边略记》有关福化建城的记载前后共有两处。其一，见于卷二大同略：

“（万历）三年俺答请城名，上赐其城曰‘福化’”。

其二，见于卷十二师中表：

“（万历）三年乙亥（第一栏，年月）”赐俺答城曰“福化”⑫。

按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写成于崇祯元年。时方孔炤任职于明朝政府兵部的职方司。因而，他是利用他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和实录秘藏来写成这部书的。这就不同于一般仅仅是根据传闻所

写的杂史，史料价值应该是相当高的。以《全边略记》和《明史纪事本末》互相印证，就可以肯定万历三年俺答所建确实是福化城而非归化城。实录所载，虽然仅是一字之讹就造成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国榷》以实录为据，所以也跟着错了。至于《万历武功录》的记载是原来就错还是后来的传抄之误，在我们没有见到天津图书馆所藏的原刻本以前，还无法加以判断。

万历三年俺答建了一个福化城既然已经肯定了，那么，归化城是哪一年建成的呢？

也许有人以为，既然我们现在已经肯定《明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在俺答建城这一件事上比《明实录》更可靠，则归化城建于万历十四年大概是无可怀疑的了。

其实，只要我们把前面所引的纪事本末有关归化建城的那一段文字再来仔细读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归化城是否建于万历十四年，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根据《万历武功录》和《明实录》的记载^⑬，黄台吉（俺答子）死于万历十三年十二月，不过明廷得报已经是万历十四年年初了。所以一般史书都把黄台吉之死记在万历十四年，《明史纪事本末》也是这样。接着，纪事本末又追叙了好几件事。“三娘子……筑城别居，朝廷赐名‘归化’”，也是追叙性质。我们并不能因为纪事本末把这件事追叙在万历十四年之下，就由此肯定归化城是在万历十四年建立的。

三娘子筑城别居之事，在《明史》郑洛传中也有记载，而且也是附在万历十四年明廷得到黄台吉之丧的讯息后追叙的^⑭。而且无论《明史纪事本末》也好，《明史》中的郑洛传也好，其中追叙归化建城之事，文字都相当含糊，本来是容易使人把追叙之事当成本年之事的。所以在刘士铭的山西《朔平府志》和张曾的《归绥识略》中，关于归化建城之事，一方面有自相矛盾的记载，一方面又都肯定“归化”之得名是在万历十四年^⑮。不过，只有

荣祥是把“归化”的建城和命名都肯定在万历十四年，而且设想出种种理由来加以论证^⑩。但是，把结论建立在含糊的根据和主观的设想上，这种结论的可靠性必然是大成问题的。

根据方孔炤的《全边略记》，归化城之命名是在万历九年。《全边略记》的大同略中，在记载归化建城之事时，其前后文和纪事本末大体相同，可能是纪事本末的根据之一，同样也没有肯定归化建城的年代，但在师中表中有如下的记载：

“（万历）九年辛巳（第一栏，年月），赐俺答祭。赐三娘子城曰‘归化’。（第三栏，大同）”^⑪

《全边略记》中的师中表是一个关于明代边防的大事年表，起于洪武元年（1368年），终于天启七年（1627年），前后包括的时间共260年。我们检查了一下年表，发现其中有个别的错误，所以也不完全可靠。而且这一条记载只肯定了归化城命名的年代，并未涉及归化城建成的年代。不过我们以这一条记载为出发点，研究了有关的材料和情况，认为可以初步肯定归化城建成或基本建成是在万历九年。

把归化城的建成或基本建成肯定在万历九年，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来考查的：

一、根据当时明朝政府的“首辅”张居正写给宣大总督和大同巡抚的两封信来看，万历九年俺答正在建筑一座新城市。

张居正的第一封信是写给宣大总督（上款仅署“答宣大巡抚”，未署收信人姓名。按“宣大巡抚”系“宣大总督”之误，当时任宣大总督者为郑洛，即郑范溪）的：

“两承翰示，一一领悉。青首事得顺义罚处，而中国之体自尊。古称虏之难制者，以其迁徙鸟举，居处饮食，不与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或量助以物料，以少慰其意可也。……”

第二封信是写给大同巡抚贾春宇（按即贾应元）的。

“……顺义筑城，是自敝之道。其所求人夫、车辆，固绝不许可；若物料，量助之以慰其心可也。……”^⑮

张居正在这两封信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我国少数民族所持的轻蔑态度以及对于俺答筑城所抱的一种特殊的幸灾乐祸的心理，我们在这里暂且不去批判。这两封信的年月，我们根据其前后所发的信以及我们所引的第一封信中所提及的“青首事得顺义罚处”一事，和《万历武功录》中的青把都列传、满五大列传、波儿哈都台吉列传^⑯以及《明实录》中所载有关事实^⑰来核对，可以判断是张居正在万历九年五、六月间写给郑洛和贾应元的^⑱。这两封信可以说明万历九年俺答正在建筑一座新城市是无可怀疑的。

按俺答于万历五年秋冬率部西行。万历六年，他在青海会到了锁南坚错（达赖喇嘛三世），并向他上“遍知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的尊号，这是达赖喇嘛得名的由来。万历七年秋，他率部东还，并于十一月回到了“大板升”^⑲。回来以后，他大概就计划兴建两大工程：建立一所新召庙和一座新城市。这两件工程，大概都是万历八年开始的。当年，召庙已经建成，明廷命名为“弘慈寺”^⑳。城市的工程较大，所以万历九年工程还在继续进行。而且因为技术力量，运输工具和建筑材料不足，所以特别请求明朝政府给予帮助。

二、这座城市一定是在万历九年建成，至少已经基本建成了。因为俺答在万历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病故^㉑，万历十年二月，明神宗“特命赐祭七坛，綵缎十二表里，布一百匹，以示优恤”^㉒。三月，明廷的使节特别亲到归化城向俺答致祭。这件事，《全边略记》中有记载：

“……游击沈栋奉敕而往，至归化城。望阙谢恩如礼。三娘子贡上马九匹称谢。

上赐綵纒劳之。”^㉓

《万历武功录》中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同《全边略记》大体相

同，不过写得更具体一些^{②⑦}。

假如归化城不是在万历九年建成或基本建成，则冬季不能施工，俺答的灵位不会设在归化城，而万历十年三月，明廷的使节也不会到归化城来致祭。

三、假如归化城不是万历九年建成或基本建成，则由万历十年到十四年，根据当时的情况看，是有可能修建归化城的。我们说没有可能，是因为有下列三种情况：

1、要修建归化城，主要的要依靠板升地区的汉族工匠。因为当时的蒙族人民，绝大多数还过着半驻牧、半游牧的生活。他们住的是蒙古包，还不很熟悉筑城建屋的技术。嘉靖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赵全等为俺答筑“大板升”，就是役使板升地区的汉人修筑的^{②⑧}。可是要动员板升地区汉族人民的劳动力，必须掌握板升地区的统治权。板升地区的统治中心在“大板升”。这个“大板升”，俺答在世时，也是俺答的统治中心，但自俺答死后一直到万历十四年十月，“大板升”和板升地区的统治权，是相继操在把汉那吉（俺答孙）、恰台吉（俺答义子）和扯力克（俺答孙）手里^{②⑨}。

2、其次，这几年之间，蒙族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相当激烈。万历十年，首先有三娘子和黄台吉之不和。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三娘子为了夺取“大板升”，曾同恰台吉和扯力克发生武装冲突，在双方斗争期间，卷入这个斗争漩涡中的蒙族首领很多，局势是很严重的。黄台吉死后，三娘子意图由他的儿子不他失礼袭封，不肯把顺义王印交出来，结果又同扯力克之间形成严重的对立。这个局面，经过宣大总督郑洛的调解，扯力克和三娘子结了婚，才算告一结束^{③①}。

3、由于这几年之间，呼和浩特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封贡互市的局面是否能够保持，在当时看来似乎还在未定之中，因此，呼和浩特地区的汉人相当恐慌。他们之中有一

部分人甚至想重新回到边内来③。

根据以上我们所介绍的种种情况，我们有相当充分的理由可以肯定：假如归化城不是在俺答未死之前，也就是在万历九年已经建成或基本建成，在万历十年到十四年之间，三娘子是不可能动员大批汉族人民的劳动力来修建一座归化城的。

问题谈到这里，读者也许还有两个疑问：1、既然归化城是在俺答生前建立的，为什么这座城在明代就已经有“三娘子城”之称？2、俺答既然已经建了一座福化城，为什么还要另建一座归化城？

我们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俺答在万历七年由青海回来以后，已经是一位年逾古稀老病侵袭的人了。归化城的修建工作，可能实际上是由三娘子主持的。而且这座城在万历九年修成，而俺答在当年十二月已病故。他即使曾经住在归化城，最多也不过两三个月。在俺答死后30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袭封顺义王的虽然有好几个，而三娘子一直是统治集团的中心人物，她住在归化城的时间可能最长。因此，很自然的，归化城就有“三娘子城”之称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

本来，呼和浩特和萨拉齐美岱召一带有一种民间传说，认为美岱召是俺答的“金銮殿”。荣祥可能是以这种传说为出发点，在他的《呼和浩特市沿革纪要稿》中，肯定了美岱召即是俺答所建的福化城。我们认为，他的这种推断有其合理的成分。

按美岱召的汉称是寿灵寺。从明代万历年间一直到清初，它的汉称是灵觉寺。这个寺院的围墙不同于一般寺院的围墙，完全是一个小城堡的规模。寺院的后面比一般寺院多出了两进房子，其中一进已倾毁，现存的一进是一座盖有琉璃瓦的三层楼房，颇象是一位王者的离宫别馆。在城后西北大青山的山脚下，有清代